

DOI: 10.3979/1673-8268.20230217003

引用格式: 季春芳.论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形成的逻辑进路[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1-8.

论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形成的逻辑进路*

季春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为形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提供了丰厚滋养。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博学广闻和深度学习,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积淀了厚实基础。毛泽东幼年时期即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和熏陶,青少年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继续研习并积极运用传统文化。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明辨慎思和科学分析,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把握了正确方向。毛泽东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也深度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并注意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结合,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笃行践履和灵活运用,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中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路径。毛泽东不断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寻求治国安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从中国传统人学中寻求治国安邦的思想启迪,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求治国安邦的丰富智慧,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实际效能。深入探究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形成的逻辑进路,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国家治理; 传统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68(2023)05-0001-08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为政之理、治吏之道的丰富智慧。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其国家治理思想亦彰显出了浓郁的传统文​​化意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博学广闻和深度学习、明辨慎思和科学分

* 收稿日期: 2023-02-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

作者简介: 季春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研究,E-mail: july0710@163.com.

析、笃行践履和灵活运用,是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形成的重要逻辑进路。

一、博学: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博学广闻和深度学习,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积淀了厚实基础

毛泽东一生酷爱学习,博览群书。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孜孜不倦的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毛泽东的思想意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博学广闻和深度学习,使其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这也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 幼年时期的毛泽东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和熏陶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此时正是清朝光绪十九年。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幼年时期的毛泽东就生活在这个新旧杂糅、但又以旧文化为主的年代。湘楚大地的湖南湘潭韶山冲,是毛泽东的出生地。在这里,毛泽东开始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

断断续续的私塾教育使少年毛泽东积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后来有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毛泽东曾在接受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1]122}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毛泽东,在年少时接受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熏陶,并从中大获裨益。后来,周恩来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并言“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2]国家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中国传统文化无疑给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提供了最初的滋养。

1902年,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踏入私塾大门,在韶山南岸私塾识读了《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传统蒙学经典。1904年至1906年,毛泽东又先后学习于韶山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等私塾。辗转于不同学堂、受教于不同老师,某种程度上也拓宽了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学习的视野。

1906年夏,时年13岁的毛泽东停学在家。作为家里的长子,他应其父要求,承担起了繁重的农田劳动和与父亲生意相关的土地抵押、粮食运输等方面的记账事务。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四处筹书。“凡是在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他都借来读了,连和尚的经书也读。”^{[3]5-6}《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就是毛泽东停学期间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对于唤起毛泽东的爱国情怀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泽东成功说服其性格执拗的父亲,重回私塾,继续学习。

(二)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进一步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此期间,“历史是他特别喜爱的课程”^[4]。同时,他也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如《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等书籍期刊。此时,17岁的毛泽东已成长为一名立志报国的少年,并萌发了对于国家治理的早期见解。在他读过的《新民丛报》原件上,留下了他对国家、宪法和君主等论述的批注,彰显了他对传统封建王朝的批判和对未来新国家管理形式的期待。

1912年春,毛泽东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3]52}。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阅读了《楚辞》《昭明文选》《读史方輿纪要》等大量古文典籍。由于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动荡,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1]135}从他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讲堂录》可以确切地了解到,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刻苦钻研了先秦哲学、唐宋古文和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并试图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路径和方法。

1917年夏,毛泽东和学友萧子升一起,以“汗漫九垓,遍游四字”的豪迈气概,赴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游学,以达“知”“行”统一。1918年夏,他又和蔡和森赴滨湖(洞庭湖)地区游学。这种读

“无字之书”的社会调查实践,深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来到全国文化中心——北京,成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并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大家。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毛泽东开始反思传统儒学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毛泽东毅然离开了风起云涌的北京,回到湖南长沙领导发动了湖南的五四运动,积极配合北京。自此,毛泽东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学习并运用传统文化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年28岁的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努力研究致用之学术,从而为社会改造做出必要的准备。由于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毛泽东学习时间被迫缩减,但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毛泽东依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学习,且更多地将学习与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第一次国共合作激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热情,然而,当时极度动荡的中国社会也影响了毛泽东的生活轨迹。1925年3月,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心灰意冷的毛泽东从广州返回上海,带着妻儿经长沙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韶山。此时,“毛泽东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埋首于他的业余爱好——阅读”^[5]。但心系国家命运的毛泽东,不久后又毅然走出了韶山。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讲授多门课程。为此,毛泽东翻阅了多部中国古代有关于史学、教育学和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大大扩展了他的知识储备量。

在艰难困苦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的学习意志也丝毫没有被磨灭。《范文正公集》就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阅读的书籍,在阅读过程中,他还以书中描绘的北宋江西剿匪的史实对比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笑称“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6] 123-124}。1932年1月,毛泽东因病住进瑞金东面的东华山古庙,重读了《水浒》《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书籍,力求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为反“围剿”寻找突破口。长征途中,生活更为艰辛,但毛泽东依然不放弃学习,甚至生病骑在马上时,也在稍微清醒之际抓紧时间读书,并以学习指导实践,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基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研究指导战争的需要,毛泽东研读了多部古典著作。毛泽东高度重视《孙子兵法》对革命斗争的借鉴作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写就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又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写就了《论持久战》。上述文章多次提到《孙子兵法》,并肯定了它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结合战争形势和建立新中国的需要,毛泽东不遗余力、不失时机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1949年3月,毛泽东与柳亚子讨论了《登池上楼》《昔昔盐》《惠崇春江晚景》等诗篇,并作答诗鼓励柳亚子以革命事业为重,为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人士、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此外,毛泽东还以其他多种形式学习研究传统文化。1949年4月,在北平戏剧界为欢迎党中央迁到北平而组织的晚会上,毛泽东观看了程砚秋的《法门寺》剧目,并点评剧里刘瑾这个角色,反对奴才思想,提倡独立思考^[7]。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继续坚持学习,以“挤”和“钻”的精神,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博览群书,力求为新中国国家治理寻求借鉴参照。为系统梳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探究社会发展规律,毛泽东于1952年特地购买了一部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反复阅读,深刻揣摩,且作了大量对当时乃至现在都意义重大的批注。直至1976年逝世前,毛泽东都在阅读和学习。毛泽东的一生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正是广博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铸就了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厚重根基。

二、明辨: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明辨慎思和科学分析,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把握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在深度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理性审视。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把握了正确方向。

(一) 毛泽东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毛泽东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剥离和提取,是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基础。

广博的文化知识是毛泽东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前提,而旧中国风雨飘摇的特殊时代,更是激发了毛泽东从历史文化中寻求救国出路的决心。在早期私塾教育中,毛泽东便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亦是立足于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倡导新兴文化。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8]338}上述言论透露出毛泽东对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紧密关系的深度认知,这对其充分利用历史文化给养现实社会的国家治理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吸收和借鉴历史文化来指导革命斗争,而每当从历史书籍中学习到有资于现实的宝贵经验时,他亦感到“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6]103}。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就曾以《水浒传》中林冲以退为进踢翻洪教头的案例论证了战略退却的问题^{[9]20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10]860},要求我们努力利用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的现实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起点。毛泽东以国家治理的站位,更加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1954年10月,在《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从中国陆、海、空军的长远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意味深长地指出,“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1],要求在国防军队建设中既要重视培养新人,又要重视向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学习。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毛泽东珍爱有加,并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发扬。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家谈话时指出:“《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12]1973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讲话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13]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对其精华部分进行继承和发扬,深度总结我国古代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态度和做法。

(二) 毛泽东深度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毛泽东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批判者和创新者。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其在包含优秀人民文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因此,毛泽东有辨别、有分析地对待传统文化,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为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国家治理思想创造了重要条件。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对于旧时代文化中的消极部分,他自始至终坚决批判。还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指出“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8]82-83}这一评判敏锐揭示出了古学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在批判的同时,毛泽东还不忘对传统文化进行积极改造,以期最终为国家的进步发展服务。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其历史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明确提到要改造东方思想^{[8]86}。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反思中国文化的走向,批判孔学对国人的思想禁锢,反对将孔子思想教条化。1919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其中论及“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8]368}随着知识的积累、阅历的扩展以及实践的深入,毛泽东更为深刻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现状,必须要进行坚决彻底的革命,而对旧文化旧习俗的批判,则是革命的重要内容。1927年3月,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农村实地考察后,写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指出“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而“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

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9] 32-33}。该文竭力批判扼杀个性、摧残妇女的封建礼教,对于大力宣传解放思想、破除封建家族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谈到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时,明确要求“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10] 1083},表达出了毛泽东意欲改造传统文化中不良因素的坚定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方面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就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要清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并言“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14] 2}。但基于国家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的考虑,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亦持谨慎态度。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和厄瓜多尔代表团时谈道“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15] 225}这一理性认识和严谨表达,体现出一名大国领袖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权衡利弊、深思熟虑的审慎态度。

(三) 毛泽东注意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结合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他积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其国家治理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如何实事求是地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用来指导国内革命,是摆在当时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继1918年8月毛泽东初次入京之后,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此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大好时期。毛泽东搜集阅读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这些书籍对当时的毛泽东影响甚大。一个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长期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青年,在时代强音的影响下,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6]。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有了全新的视角,并以更为辩证、更为科学的态度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国家走向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虽是异质文化,但却又有很多共通之处,这也是二者之所以能相互契合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前进,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7] 533-534}同时,他还特地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7] 534}。其上述观点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即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文化的视角,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7] 707}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情况新形势,毛泽东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国家治理服务之外,还积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15] 263-264}这一论断通俗易懂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国家治理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亦为后人留下了深刻启示。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而灵活地结合,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三、笃行: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笃行践履和灵活运用,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路径

毛泽东高度重视将传统文化的智慧运用到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当中,从而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实际效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断从中国哲学、人学、文学等传统文

化中汲取前进的动力,这也为其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路径。

(一) 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寻求治国安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灵魂,“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8]。中国古典哲学遗产丰富、思想深邃,深深影响到了毛泽东的国家治理思想。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具体地、历史地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纳入了新中国的国家治理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如何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的大国顺利实现国家治理,无疑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客观难题。毛泽东在把握时代趋势、回答实践需要、顺应人民期待的基础上,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了科学挖掘,灵活地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运用到了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上。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讲话,该篇讲话是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突出表现,亦是指导新中国国家治理的纲领性文件。《论十大关系》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秉承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闪耀着哲学智慧的光芒。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动体现,亦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具体应用。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灵活地实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与新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对接,实事求是地指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时,要做到两点论,“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14]41}。为进一步巩固中共八大的成果,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辩证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性,并以大家普遍熟悉的中国古典哲学中有关于“动”和“静”的公案为语境背景,指出“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19]，“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19]。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14]28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矛盾的相互转化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思维因子,引用了道家学说《老子》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名言^{[20]793-794},将中国古典哲学很好地融入了新中国的国家治理当中。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道“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一日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21]毛泽东为表达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可分的观点,还以《庄子·天下篇》中寓意深刻的文字为其诠释,古为今用,点石成金,在传承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同时,亦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英国科技哲学学者T·李约瑟曾言:“辩证唯物主义发源于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改造,而后又转向了它的发源地。”^[22]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扬弃与改造,使这个产生于东方古老大地上的中国古典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大放光彩,指导了新中国攻坚克难、谋篇布局的国家治理实践。

(二) 从中国传统人学中寻求治国安邦的思想启迪

人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对于自幼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毛泽东影响很大。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辩证吸收了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合理部分,并将其灵活运用到了新中国国家治理上。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毛泽东“人民至上”理念的源头活水,周公的“敬德保民”、孔子的“富民、利民、教民”、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管子的“修法安民”,以及唐宋明清时期的各种民本论,无不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奠定了深厚的人学基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喊,表明了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是为了改变旧中国人民被压迫被欺凌的生存状况,实现人的真正平等和当家作主,从而最终达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思想高度契合了中国传统人学思想。在读《二十四史》时,毛泽东曾感慨“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23]毛泽东透过纷繁的历史事件,批判了《二十四史》中不符历史真相的描述,肯定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还非常爱护“人”,认为

只要做工作,犯错误在所难免,但关键在改。这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观念是高度吻合的。还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曾提道“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24]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次会议上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25] 1956年4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说道“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14]40} 上述论断辩证地指出正确和错误可以相互转化,正确处理问题,消极因素亦可以转为积极因素。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再次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26] 毛泽东从中国传统人学思想中获取的思想启迪,为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 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求治国安邦的丰富智慧

中国古代文学浩瀚广博,其中不少作品寓意深刻,蕴含着国家治理的大智慧。毛泽东饱读诗书,文学功底深厚,并主动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与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紧密结合,发挥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新中国国家治理当中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力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经验启示,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家治理方面给了毛泽东诸多启迪。1953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例,充分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700}。毛泽东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起到了重大影响,也为国家治理的人才队伍建设把握了正确方向。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以《红楼梦》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名言来类比当时的国际形势^{[14]321}。“东风”指的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西风”指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类比形象生动地表达出了当时我国的外交战略,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对于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影响。1959年9月,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又以《西游记》的典故,来类比党在处理各方面事务时所应掌握的科学方法,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游记》上许多故事都讲到,开始时不知道是什么精在作怪,是蝎子精,还是蜘蛛精,还是从太上老君那里跑掉的一匹青牛?就是搞不清楚。只看现象,就搞不清本质;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捉怪。”^[27] 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阐释神话世界同现实世界同构关系的做法,既使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又为我们当前合理利用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参照。

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为形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提供了丰厚滋养。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博学、明辨、笃行,是其国家治理思想之所以彰显出浓郁传统文化意蕴的重要原因。当前,深入探究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传统文化意蕴形成的逻辑进路,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3.
- [3] 孙东升,马京波.毛泽东的读书之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4] 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M].全小秋,杨小兰,张爱茹,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37.
- [5] 瑞贝卡·卡尔.毛泽东传[M].龚格格,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53.
- [6]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 [7]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实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258.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9.
- [12] 毕桂发.毛泽东评说文人墨客[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7.
- [13] 周继强,王太岳.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纪实:第4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160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6] 毛泽东.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0.
- [19] 中共中央党校.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429.
- [20]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1]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03-104.
- [22] 邓力群.哲学大师毛泽东: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232.
- [23] 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N].光明日报,1993-12-20.
-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
- [25] 赵云献.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82.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12.
- [27] 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8.

On the log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JI Chunfa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notion, wisdom, bearing and cha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provided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style. Mao Zedong's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in-depth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his national governance thought. He received enlightenment and influence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his childhood and further strengthened his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his teenage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continued to study and actively apply traditional culture. His clear and prudent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guided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Mao highly value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deeply criticized the dro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dialectical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and while adhering to the root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e also promoted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Mao's commitment to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d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his national governance thought. He constantly sought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governing and ensuring peace in China from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de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governing and ensuring peace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 studies, and abundant wisdom for governing and ensuring peace from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lly utilizing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his though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Mao Zedong; national governanc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编辑:蔡秀娟)